

去妖魔化：贤能政治的当代使命与世界意义

贝淡宁 李东阳

[内容摘要] 在国际政治中，妖魔化是指一些国家利用强势的国际话语权，制造和包装出他者完全邪恶的形象。中国是当前全球妖魔化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妖魔化中国源于欧洲政治学说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余毒，二战后西方世界沿袭了“中国专制”共识，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一人一票”是选择政治领导人的唯一合法方式。他们拒绝接受贤能政治等其他方式成为备选方案。要想将妖魔化中国的影响降至最低，必须充分重视贤能政治的当代使命与世界意义，既要打破民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二分法，也要为中国在全球层面上的参与和国内的民主改革实验留出更多的空间。

[关键词] 妖魔化；贤能政治；选举民主；中美关系

根据《剑桥词典》，妖魔化（demonize）意为“试图让某人或一群人看起来完全邪恶”^①。在国际政治中，一些国家利用强势的国际话语权，美化包装本国政治模式与文化价值观，丑化、矮化他国的政治模式和本土文化，全面制造他国虚假的邪恶面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妖魔精怪常被用来比喻邪恶势力，向来是重视德性政治的儒家士大夫们极力蔑视与排斥的符号，因此妖魔化中国的现象往往令熟稔其贤能政治传统与理性文化的人感到无比错愕。从政治哲学的领域考量，妖魔化他人的动机也十分令人怀疑：也许有些人是完全邪恶的——例如希特勒，但是任何一群人都绝不可能是完全邪恶的。事实上，在任意的社群中，“好人”与“坏人”都同时存在，而且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好”与“坏”的混合体。所以当一群人被妖魔化时，不管试图妖魔化他人者有意与否，其结果必然指向遮蔽真相的谎言。妖魔化一群人的行为说明妖魔化他人者自身更接近邪恶的妖魔：要么妖魔化有一个可耻的议程——他或她试图煽动对他人的非理性仇恨，要么妖魔化他人者持有严重的虚假观点。

一、妖魔化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在当代的延续

妖魔化中国的现象并非今日所特有，而是与历史上的“东方专制主义”偏见相关，有其具体的发展脉络。“东方专制主义”的刻板印象源于欧洲中心的世界史观。早期欧洲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一般对中国持有积极正面的印象，一些学者甚至对中国的尚贤传统和德性政治青睐有加。^②然而，伴随西方世界的崛起，一个“专制中国”的形象被制造出来，有学者进一步判断认为，

^① “Demonize”,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demonize>,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2.

^② 18世纪德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天子诸侯在道德和智力上的卓绝表现，认为值得欧洲国家借鉴效仿。参见[德]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李鹃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从 16 世纪末到 19 世纪，欧洲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般至多把中国看作是欧洲的附属物或者是值得同情的外延部分而已”^①。孟德斯鸠标志性地将东方国家的政体归于恶劣的专制政体，称“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②。在他定义的专制政体中，“这类国家可以说根本没有法律，只有习俗和风尚，颠翻习俗和风尚无异于颠翻一切”^③，人们只能对长期停滞保持缄默，否则就会立刻引发革命；君主凭借个人意愿和心情行事，教育旨在降低心志、培养奴隶，而人一钱不值，没有美德和荣宠观念，如牲畜般被要求绝对服从。但是他又承认中国不属于完善的专制政体，而是具有某些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特征的混合政体。可见，孟德斯鸠对中国专制的判断难以自圆其说，但如果充分考虑到他更多怀着对欧洲政治的现实关照来提出适用于东西方的分析框架，就不难理解他将中国划入专制国家的动机。遗憾的是，“针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宣传，而不是其更富洞察力的具体分析，支配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乃至中国对礼教传统的理解”^④。

的确，在此后欧洲中心论者的意见中，中国的形象被进一步曲解。黑格尔等学者曾不同程度地质疑中国在世界史进程中存在的价值。黑格尔认为，在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专制政府下的中国人看似平等实则没有任何自由，人民“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⑤。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似乎也印证了中国游离于主流世界进程以外的臆想，于是一面是暴敛无度的专制政府，一面是愚昧无知的民众，传统中国的形象一再受到欧洲中心论者的妖魔化塑造。18 世纪美国独立革命前夜，波士顿倾茶事件中也曾妖魔化出中国茶叶的“摄魂论”，有人声称，“喝了这种茶叶沏的茶，东方专制主义便会潜入北美殖民地居民的体内，摄走他们追求自由的灵魂，让他们永久匍匐在英国君王的脚下，就像中国种茶的奴役匍匐于他们的专制皇帝脚下一样”^⑥。可以窥见，妖魔化他人的议程中含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到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建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时，对中国的描述已经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并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实际。^⑦如今，胎生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妖魔化中国的企图阴魂不散，卷土重来了。^⑧

今天，中国是全球妖魔化的主要受害者，而试图妖魔化中国者主要是美国政府官员和主流媒体机构。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加速了全球扩张的步伐，妖魔化现象成为这一过程的特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凭借强大的话语工具，集聚起了几乎无人能敌的话语优势和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成功地妖魔化了他们所不喜欢的中东、北非国家领导人，

① [美] 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 页。

②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52 页。

③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 361 页。

④ 李猛：《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天津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 期，第 44 页。

⑤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7、137 页。

⑥ 王元崇：《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文汇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91 页。

⑦ 李祖德、陈启能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25 页。

⑧ 西方学界承认“东方专制主义”已不适用于当代中国，而是采用了“威权主义”“全能主义”“极权主义”等解释框架。从本质上看，这些框架仍然延续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强烈偏见，突出强权对社会的控制属性，映射出西方式选举民主国家对非选举民主国家的话语特征。

并使自己的战略图谋恰当地掩藏在听起来颇有蛊惑力、颇具道义优势的话语说辞中”^①。可以说，在妖魔化他者的领域，美国及其亲密盟友已具备了整套模板和丰富经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崛起和全球影响力的意图空前强烈，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充当了这一意图的帮凶；拜登政府更倾向于采用怀柔手段达成同样的目的。毋庸置疑，在对华政策领域两党罕见地统一口径：他们不喜欢中国。美国几乎毫不掩饰种族主义倾向，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前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称，美国已经陷入了“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有一个不是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②在一个广受欢迎的深夜电视节目中，CNN首席国家安全记者吉姆·休托（Jim Sciutto）说中国人“有点微妙地邪恶……像暴徒一样”。他引用了联邦调查局前反情报负责人的话：“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恶毒，他们会杀了你，他们会杀了你们的家人。”^③在这样的舆论灌输下，无怪乎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民支持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政策。^④更令人震惊的是，面对疫情肆虐和俄乌冲突这样的全球性灾难性事件，妖魔化中国的状况依然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严重挫伤了全球合作的可能性。

但更“细致”的妖魔化中国者通常会区分“好”的中国人民——如果他们有机会选择的话，他们更想要美国式的民主和生活方式——和被描述成镇压中国人民的“邪恶”的中国共产党。^⑤正如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前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所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隐患……美国的敌人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是这个野蛮政权的首要 and 持续受害者。”^⑥而拜登政府也不遑多让，十分热衷于炮制中国国内人权问题。同样，媒体机构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通常会巧妙地把中国人民描绘成值得同情的形象，这与新闻报道中国共产党几乎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形成鲜明对比。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在过去几年呈现爆炸式的增长趋势，甚至连一些之前保持中立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支持一份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的报告，这份来自胡佛研究所的报告毫无凭据地警示，中国政府正在“利用我们民主社会的开放性来挑战，有时甚至会削弱美国关于自由、规范和法律的核心价值”，报告作者同时细致地区分了中国人民和领导者：“在整个报告中，‘中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而不是整个中国社会或整个中国人民。”^⑦有趣的是，中国人通常也对美国人民和政府加以区分，他们批判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但仍然会以美国为参照，

① 陈正良：《软实力发展战略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② 转引自 Peter T.C. Chang, “To Avoid a Clash of Flawed But Great Civilizations, the US and China Must Address Their Own Deficiencies and Hubris” (May 31, 201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012316/avoid-clash-flawed-great-civilisations-us-and-china-must-address>,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2.

③ 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Jim Sciutto: ‘Star Wars’ Like Conflict Is Actually Happening” (May 24, 2019),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9VJzrxxdE8>,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2.

④ “Most Americans Support Tough Stance Toward China on Human Rights, Economic Issues” (March 4, 2021),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1/03/04/most-americans-support-tough-stance-toward-china-on-human-rights-economic-issues>,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2.

⑤ 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并不总是完全区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例如，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受到的伤害远远超过中国的政治精英。

⑥ Stephen K. Bannon, “We’re in an Economic War with China. It’s Futile to Compromise” (May 6, 2019),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steve-bannon-were-in-an-economic-war-with-china-its-futile-to-compromise/2019/05/06/0055af36-7014-11e9-9eb4-0828f5389013_story.html?utm_term=.487664ad56eb,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2.

⑦ Hoover Institute Essays, “China’s Influence and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November 28, 2019), Hoover Institute,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hinas-influence-american-interests-promoting-constructive-vigilance>,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2.

温和比较发展水平、开放程度、政府效率，寻找自身不足，客观承认美国社会有许多可取之处。

立场更加客观的中国专家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执政组织也具有实质的多元化。他们通常认为美国不应寻求推翻中国共产党政府，而应当寻求以更温和的形式与其接触。但即便是这样的观点，本质上仍然是要限制中国的崛起。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国专家小组签署了一封信，谴责中国“国内镇压的不断升级”及扮演“更具侵略性的国际角色”；然而，美国无法通过单打独斗来阻止臆想中的中国“作恶”，“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有利策略，必须侧重于与其他国家建立以支持经济和安全为目标的持久联盟”，美国需要“与盟友合作，以保持威慑力”。^①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核武器管制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可能性被有意忽视，而两个大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被刻意放大了。在如此局促逼仄的双边关系地带中，美国向中国学习借鉴的可能沦为一种奢侈。

总之，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的主流观点——无论他们持有何种内部分歧意见——坚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崛起需要受到削弱和遏制，倾向于未来中国能够按照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制进行改革，使政治权力在不同执政理念的党派之间交接轮替。讽刺的是，美国自己离以联邦代表来控制党争的理想也相去甚远，在这一理想中，共和政体“选拔见解高明、道德高尚”、能够制订“超出局部偏见和不公正的计划”^②的联邦代表。对中国，他们近乎偏执地希望中国共产党为其他潜在的政治家，尤其是那些更同情“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家腾出执政空间，以使中国与他们共享美国式的价值、规范和法律，否则他们就不会停止诋毁和谩骂。那些把中国作为长期威胁的人越是费尽心思区分一个“坏”的执政党，以及一群值得同情的“好”的中国人民，越是暴露出其议程：将颠覆中国执政党预定为结束一切妖魔化中国行为的前置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东方专制主义”的幽灵复活了，只不过妖魔化他人的主体和方式有所改变。然而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醒的那样，“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③，以文明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妖魔化他人绝非明智之举。

二、妖魔化中国产生于美国式选举民主的困境

为了便于论证，让我们首先假设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是真正致力于反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而不是针对全体中国人民，并且这种区分是完全可行的。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否像美国所宣传的那样“邪恶”？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共有 9671.2 万名党员，这些党员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包括 659.4 万名工人，2592.3 万名农牧渔民，以及人数众多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新发展的党员中，女性、少数民族、35 岁及以下、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越来越多。^④正如前文所述，任何社群中都同时存在“好人”与“坏人”，而且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好”与“坏”的混合体，很难想象用“邪恶”一词

① M. Taylor Fravel et al., “China Is Not an Enemy” (July 2, 2019),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making-china-a-us-enemy-is-counterproductive/2019/07/02/647d49d0-9bfa-11e9-b27f-ed2942f73d70_story.html?utm_term=.4f568789a758,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2.

② [美]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58—59 页。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1 页。

④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2022 年 6 月 29 日），共产党员网，<https://www.12371.cn/2022/06/29/ART11656486783270447.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2 年 10 月 20 日。

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及它的9000多万名党员。党员的背景非常多元，并密切联系着整个中国社会，特别是沿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网络，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亲属、朋友、同事中找到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他们绝不会使用“邪恶”来形容自己的亲属、朋友和同事。

如果我们把关注重点转移到北京的高层政策制定者身上，是否美国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会变得明显？妖魔化中国者称，北京的高层决策者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例如，审查制度的增强压制了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言论自由、日益提升的军事实力影响邻国安全、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宗教极端主义过度反应，以及在香港侵犯公民权利等。这些指控通常基于西方式“民主”“人权”话语的表述，认为美国利益受到损害。但是，所有对中国的指控都不足以证明中国威胁美国利益、破坏全球秩序，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拥有震慑全球的军事实力和持续的价值输出。从全局来看，中国从未对世界如此开放：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即便是在全球疫情影响下，仍然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① 中国人的自由人权意识也在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有超过8亿人摆脱了贫困，特别是偏远农村的低收入人群；同时，工作、婚姻、居住方面的法律保障在持续完善，一个“极权主义”政府在当今中国人民看来是不可想象、不切实际的。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兼有开放自由和“奴役人民”两张格格不入的面孔呢？

总的来说，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愈演愈烈。21世纪初，有学人称对中国的“妖魔化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意识形态问题又是经济利益问题，既是美国政客、议员的需要，也是美国利益集团的需要”^②，这一分析中的情况在20年后更加变本加厉。对9671.2万人的妖魔化，让妖魔化他人者看起来更接近邪恶的妖魔。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曾经指出：“过去一年的反华转向更多的是由美国自身的焦虑引发的，而不是由中国的行动引发的。”^③ 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美国的精英们会如此痴迷于利用“中国威胁论”？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价值观在得到广泛认同时能够成为软实力的基础”^④。对软实力的追求无可厚非，正如美国价值观远非宣传塑造得那样完美，它的理想与制度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⑤ 中国的价值观与制度之间同样存在着一定差距。问题并不在于对理想与制度之间存在的差距采取何种态度，而是在于既要极力否认本国鸿沟的存在，又要竭力放大和制造他国的“鸿沟”，这样的双重标准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戕害了基于尊重与包容的合作关系，妖魔化中国者必须对此负责。

在美国选举民主制度下，这种行为的一个重要动机在于通过妖魔化敌人获得大量支持。美国政党的首要目标是赢得选举，在仅有两党参与和压倒性无意识形态的选民条件下，他们原本采用更温和、中庸的意识形态来吸引处于中心位置的选民。^⑥ 然而，最近的选举现象表明，政党

① 《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201/t20220117_1826479.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2年10月20日。

② 田炳信：《论美国妖魔化中国》，暨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6页。

③ New York Times Opinions, “Is It Too Late to Stop a Cold War with China?” (June 8, 2019),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08/opinion/sunday/trump-china-cold-war.html?action=click&module=Opinion&pgtype=Homepage>,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2.

④ [美]约瑟夫·奈：《论权力》，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等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页。

⑥ [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路易斯·舒伯特：《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林朝晖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

正在利用选民的无知改变这一规则,妖魔化他人者的目的就是在选民中“煽动愤怒和恐惧的情绪”,这样做更容易获得非理性选民的“信任和忠诚”^①,因为炒作一种来自他国的威胁容易转移和掩盖公众对本国问题的关注和担忧,同时也能转嫁责任。此外,煽动性议程更容易激发选民的狂热,在政治参与趋于冷漠的时代,危言耸听的话语和强硬的做派越来越成为美国政党扭转败局赢得大选的制胜法宝,民粹主义甚至公然成为毫无经验的政治素人上位的合作伙伴,将严肃、理性的政治活动变得面目全非,以此来迎合那些盲目、冲动的选民群体。赢得选票仅仅是妖魔化中国过程的表面现象和一般特征,还不足以解释当前对中国的妖魔化在整个美国社会的疯狂生长。更为关键的是,妖魔化中国者对美国式价值观与一人一票选举制度的优越性坚信不疑,并对“文明冲突”论和单极世界呈现出信徒般的狂热,否定和拒斥其他文明和制度的经验与成果,从而建构了由自我意识出发的“他者”概念,这驱动着他们不断为妖魔化中国而奔走。例如,利用美国价值观中根深蒂固的反政府特征,从“强大的政府必定是非法的,合法的政府必定是弱小的”^②这一逻辑出发,尽力将中国塑造成美国价值观的对立面,尽管美国自身价值观亦问题重重、正逐渐失去对外界的吸引力,尽管他们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历史、结构以及作用。

在笔者看来,对中国政治精英们的妖魔化源于美国政府意识到“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这种反应是一种“自爱”(self-love)的形式。美国政府坚信通往现代化的政治道路是唯一的,因此随着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会逐渐接受并认同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优越性。但这些希望已经破灭了。著名小说《全民选举》(*The Suffrage of Elvira*)就刻画了初尝民主的小镇相互攻讦、虚假竞选的社会丑态,映照出不顾社区实际需求,照搬民主形式带来的创伤。而中国在经历了“全盘西化”的阵痛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传统。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向西方寻求经验,这对西方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迎合——不仅迎合了“东方专制主义”偏见的经验,也迎合了未来文明单向度趋同的西方式预期——但现在中国人自己的传统而感到自豪,他们更多地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汲取本土化范式的灵感,同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中取得的进步又反过来增强了民族自信。如基马尔主义的退潮,“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③。但是,民族主义倾向值得东西方国家警惕:“全体人民实质上都以无条件的献身和强烈的感情支持国家的权力欲望”,“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化的普世主义却主张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有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强加给其他所有国家”。^④

然而,真正令美国担心的是,“他们”将彻底超过“我们”。本质上,利益受挫正是源于美国式民主制度的缺陷。托克维尔曾提醒人们,“当一个人或一个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想他或它能向谁去诉苦呢?向舆论吗?但舆论是多数制造的。向立法机构吗?但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多数。向行政当局吗?但行政首长是由多数选任的,是多数的百依百顺的工具”^⑤。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也相信民主总是携带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或欺压的行为,他认

① [美]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推特治国:美国的财阀统治与极端不平等》,法意译,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16—117 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第 66 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67 页。

④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7、367 页。

⑤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318—319 页。

为“种族清洗本质上是现代现象”^①。更不用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几乎完全放弃了其全球责任，虽然拜登政府重新做出了承诺，但人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承诺的脆弱性：没有政治经验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可以通过每天撒谎和挑动人民最极端的情绪来当选，整个国家正在失去其政治、经济主导地位。面临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国家需要对全世界和子孙后代负责，但是美国式选举民主国家的政治平等仅存在于政治共同体内部：他们无视共同体边界之外的人，特别是当其利益与共同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可以说，领导人对本代人的关注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为了获得选票而为政治共同体中的选民服务，很少考虑子孙后代的福祉，更不会顾及居住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外国人的诉求，即使是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但是，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政治领导人会做出影响子孙后代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决定，他们在做出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他者的利益。不幸的是，在美国式民主制度中，很少有人真正代表子孙后代和外国人的利益诉求发声。

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更具“公共性”和“长期性”，会潜在地考虑子孙后代和外国人的需求，这显然受到儒家文化及贤能政治传统的深刻影响。中国人重视伦理情谊，“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②，“他人”自然也包括子孙后代，而很早孕育的天下观也有利于中国人超越当代民族国家视域，促使德行高尚和能力卓绝的政治领导人制定更全面、长远的公共政策，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带头作用是最好的例证。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概念发展迅猛，毫无疑问将在几十年内从根本上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战略，应用人工智能来建设更加理想的未来社会。中国文化信服“近悦远来”的道理，以“共商、共建、共享”推进邻国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支持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平等合作消解地区对抗的可能性。中国也需要解决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包括尚贤制的异化、官员的腐败、权力边界模糊等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选举民主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需要关心下次选举的结果，所以很难计划与实施任期内四五年之后的政策规划，而政治经济上缺乏长期规划的劣势又转换为竞选对手攻讦的武器。要转移视线，最廉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塑造一个妖魔化的对手：一个专制、野蛮的敌人应当为美国社会的相对衰落和不幸买单。

三、去妖魔化：贤能政治的当代使命与世界意义

妖魔化中国造成的不良后果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话语的世界影响力，增加了中国政府维持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的成本负担，同时也为中国的全球参与蒙上阴影，令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各方顾虑重重。因此，去妖魔化既是破除西方话语陷阱的需求，也是中国重新思考和建构自身全球角色、发挥大国作用的契机。如何才能去除对中国的妖魔化呢？可以观察到，中国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众层面，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发出中国声音、改变中国形象。例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充分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冬奥符号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既展现了独特的东方审美，也表达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体育精神。然而，与美国全方位、全时段的妖魔化中国现象相比，这样的正面表达无论在渠道上还是量级上，依然难以扭转根深蒂固且仍在持续生长的偏见。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预言“历史的终结”引起远超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① [英] 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严春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②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贤能政治可以如何减少对中国的妖魔化呢？首先，贤能政治可以打破民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二分法。2021年12月，拜登政府特意召开了全球“民主峰会”，并将中国排除在外，提出“在国内更新民主，在国外对抗专制”。从“民主”和“专制”的角度来包装这场新“冷战”无助于理解中国的政治体系，认为所有不通过美国式民主选举方式选出领导人的国家都具有同样的独裁性质，这样的思维显然是错误的。中国的国家权力不是由家族或军队控制的，它原则上充分汲取了贤能政治的经验，教育和政府中的机会平等增强了合法性，领导职位被分配给道德和能力相对优异的政界成员。中国人相信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表率，但在政治生活中基于个体道德和能力差异作出的政治判断因人而异，贤能政治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识别那些道德和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的人。^①因此，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建立一个复合的官员体系，旨在选拔和培养政治经验、能力和美德高于平均水平的公职人员。当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仍然有一些差距，中国的尚贤制度尚不完美，就像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完美一样。但是，贤能政治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中国进步的道德标准，就像民主也可以并应该成为美国进步的道德标准一样。这里的重点不是否认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有效性。所有国家都需要尊重基本人权——不被杀害、折磨、奴役的“消极权利”，以及享有体面物质生活的“积极权利”，但我们确实需要允许以不同的方式选择和提拔政治领导人。为什么所有国家都应该使用相同的机制来选择领导人呢？显而易见，合宜的机制应当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规模和当前的需求。在美国有效的东西在中国并不一定有效，绝不能“削足适履”。很少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改革家质疑这一点，美国却很难摆脱“一人一票”是选择政治领导人唯一合道德性的方式这一教条主义依恋。澄清贤能政治绝非专制，既是为了矫正“东方专制主义”的刻板印象，同时也能使当代那些基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妖魔化指控不攻自破。

然而，仅仅是观念上的改变是不够的。中国应该增强话语权建设，不仅仅是话语渠道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对核心话语的塑造、组织与传播，从被动走向主动。最近有学者将贤能政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结合在一起，这是一次有益尝试。^②如果中国的尚贤传统确实有一些优势，那么贤能政治的声音就不应该被埋没，它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和讨论，并通过不同的渠道充分表达；同时，应当在全球参与中主动体现贤能政治实践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效果。美国单方面主导世界经济政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竭力输出和分享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它更像是“家庭式”的：权威的家长向稚童灌输其观念和经验，并要求稚童按照路径依赖成长，稍有差池便构成对家长权威的颠覆性挑战，缺乏容忍的空间。相反，贤能政治的观念和模式更接近于“邻里式”的：邻里之间边界清晰，房舍有院墙，土地有四至，为各自的生活留足了余地，但同时他们又在村落范围的公共场域和各种关系组成的文化网络中互惠互利。东亚各国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可以首先尝试建立一个欧盟式的区域组织，让东亚国家在安全和贸易问题上结成联盟。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中国将拥有最多的发言权（就像德国在欧盟拥有最多的发言权一样），但它将受到区域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共识机制和有利于各方（包括弱国在内）的共赢政策的道义

^① 许多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例如，孙中山提到，“知难行易”，人群中少数“先知先觉”者唤醒“后知后觉”者，带动大多数“不知不觉”者；钱穆认为，代表民意的不是人民中的多数，而是人民中的贤者；梁漱溟亦赞同，由少数知识分子领导多数民众；潘光旦指出，掌握政权的人应从“上智”的一部分人中选出来。这些观点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民主尚贤政治观。

^② 刘九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约束。这样的合作框架在东亚是可行的，特别是在具有贤能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将大放异彩，因为中国式的“贵和尚中”发展理念比美国式的“利益优先”更符合东亚需要。这一构想看似有些乌托邦，美国不愿意放弃在东亚的既得利益，东亚一些其他国家也对中国存有戒心，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候提倡一个欧盟式的组织听起来更加乌托邦，然而它最终真实地发生了。

长期来看，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将有助于缓解世人的担忧，使得中国进一步改善其全球形象，破除妖魔化塑造的虚假意识。但是，有两个方面令人顾虑：首先，高层的民主选举会削弱中国贤能政治的优势，缺乏基层经验和道德使命感的领导人疲于短期博弈，可能会迎合特殊利益群体的诉求；其次，高层的民主选举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在美国及其盟友从外部对抗的格局下，进一步进行民主实验的意愿会受到影响。这些顾虑并非心血来潮。学者钱穆曾用“信托”关系描述中国式民主尚贤制：民众基于信任，自愿将政治事务委托于贤能，但是如果被委托的贤能不能履行道德义务和政治责任，就会失去信任，导致双方“信托”关系破裂。“信托”关系蕴含着如下两个逻辑。其一，中国式民主观与美国式民主观显然有差异，它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哲学文化、国家规模、社会结构等集合形成民族心理和政治认同，这意味着高层的民主选举必须割裂本土化经验，放弃长期依托的考试机制和选任标准，并承受由此带来的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其二，政治活动是十分复杂的专业性、公共性事务，需要从知识分子中考选出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能力的人代表社会全体民众。一方面，一人一票的结果很难符合中国人对政治领导人的高度期望；另一方面，民主权力来源的正义不代表民主行使过程同样正义，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早已对迷信一人一票制能够表达公众意愿的幻想发出警告，指出公众舆论不过是旁观者的声音，“民主的虚假理想只能走向幻灭和好管闲事的暴政……公众必须归位，做他该做的事”^①。在美国式民主制度下，人们虽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权利，但投票的结果总是凸显出社会撕裂：近几届美国大选结果差距总是微乎其微，这意味着近半数的美国人被迫接受一人一票的结果。总的来说，选举民主陷入了恶性政治循环，单凭民主内部调节实现自我救赎是困难的，这也意味着贤能政治能够向世界分享更多的经验。

不难想象更多乐观的场景。正如亨廷顿建议的那样，美国应该承认现有制度与行为同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理想存在一定差距，同时也要明白这些理想对其他社会的适用性是有限的。^②美国政府应意识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会永远保持世界第一，中国也不是“邪恶的”国家，仅仅因为它不通过一人一票来选择最高领导人，就将其归结于专制阵营是错误的。美国和中国政治制度都有利有弊，两种制度应当互相借鉴，并学会与差异共存。中国也能从更完善的贤能之治中受益，在全球事务和谋求人类福祉的多边外交中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同时秉承贤能观推动国内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实验，防止民主化过程中西方选举民主的固有缺陷和困境，超越既有的民主理论和范式。重振贤能政治，需要以尚贤传统的当代应用为根本，以提升整体治理水平为旨归，完善贤能政治理论建构，积累贤能政治实践经验，重塑贤能话语的全球吸引力，彻底消除妖魔化中国的不良影响。

① [美] 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林牧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3 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第 415 页。

从根本上消除数百年来“东方专制主义”对中国的一再误解，摆脱惯有的专制标签对中国形象的歪曲，需要基于历史事实和当代论争，再次辨识有益的传统资源，肯定合宜合理的本土价值，这对于中国去除妖魔化显得尤为关键。不落于西方式话语窠臼，重新理解尚贤传统和当下的选任实践是贤能政治必须承担的当代使命。需要指出，当代贤能政治无意致力于建构何种宏大的政治图景，而是要在中西方政治语境中重振中国先贤和古希腊哲人所共同珍视的基于德性和能力的尚贤价值理念。在此维度上，发轫于先秦时期的尚贤传统，势必可以提供更多有益的治理资源，^①这些治理资源不仅有助于中国政府从尚贤传统中寻找合法性，削弱妖魔化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能够帮助善于“从全体人类着眼”^②的中国文化尽力发挥其世界关怀，为西方选举民主解决自身困境提供镜鉴，为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形塑本土化的现代政治道路贡献中国智慧。

第一作者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第二作者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李东阳、贝淡宁：《先秦贤能政治观的形成与嬗变》，《孔子研究》2022年第1期。

② 唐君毅：《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载张学明、何碧琪主编：《诚明·奋进——新亚精神通识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香港）2019年版，第16页。